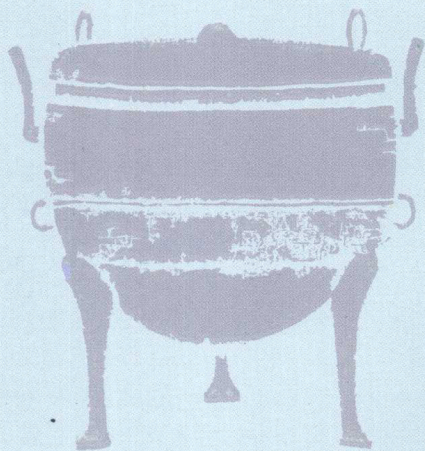




青年学者文丛



斯文及其转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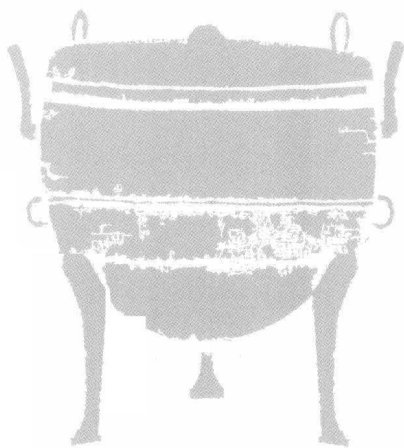
◎陶磊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者文丛



斯文及其转型研究

◎陶磊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文及其转型研究 / 陶磊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308-10471-5

I. ①斯… II. ①陶… III. ①政治思想—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 IV. ①D0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8360 号

斯文及其转型研究

陶磊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文字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471-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总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



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 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①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



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目 录

绪 论 斯文·政治·思想	1
第一章 政治的发生	15
第一节 政与事	16
第二节 正与教	19
第三节 正与政	26
第四节 “政者正也”观念的孕育	30
第五节 求正的历程	35
第二章 斯文与德礼政治	42
第一节 德礼政治与政教一体	42
第二节 德礼政治与政、事分离	47
第三节 斯文与德礼政治	53
第四节 早期儒家对德礼政治的阐述：《大学》	58
第五节 早期儒家对德礼政治的阐述：《中庸》	63
第三章 从政到治：先秦政治理性的觉醒	69
第一节 家天下之共同体观念	70
第二节 政治观念与军事理性	74



第三节	法与政治理性	80
第四节	政、治一体与“政治”的出现	84
第五节	政治理性与理性政治	89
第四章	礼、法周旋:以名、数为基础的考察	94
第一节	战国人观念中的礼与法	95
第二节	礼、法之辨:名	99
第三节	礼、法之辨:数	105
第四节	改法为律	111
第五节	质法与文法	116
第五章	试论古代法治的政治背景	124
第一节	爵与政事之关联	124
第二节	官政与官法	129
第三节	依法治国与法治精神	134
第四节	法治精神与史官文化	140
第五节	巫统、血统与政治文化	145
第六章	从礼政到法政:礼法的出现	151
第一节	荀子前的以礼为政思想	151
第二节	荀子的礼法思想	157
第三节	荀子与道法思想	161
第四节	荀子的尚文思想	165
第五节	荀子的“一天下”观念	170



第七章 世俗的超越:道法的出现	176
第一节 老、庄与政治	176
第二节 《黄帝书》与天法	180
第三节 《黄帝书》的援道入法	185
第四节 《鹖冠子》的道法思想	191
第五节 慎到与《管子·心术上》的道法思想	196
第八章 政治文化转型与斯文重建	202
第一节 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之一:尊帝	203
第二节 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之二:重官	208
第三节 秦、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转型	213
第四节 一统政治与独尊儒术	220
第五节 斯文重建	225
结 语 道德·理性·法律	232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51



绪论

斯文·政治·思想

—

人类与动物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文明发展到今天,某种意义上讲,与先民打击第一片石器,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政治、思想是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衍生物,现代历史学将文化与文明分为两个阶段,以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出现、金属工具的运用、礼仪建筑的诞生等,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这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讲是合理的,没有文字的阶段的历史叙述,其真实性是有问题的;而没有城市、金属工具、礼仪建筑等标志物,就没有后来的国家、理性等现代文明要素的发展。但有一点,笔者以为应该认识到,无论是文明阶段,还是前文明阶段,人类创造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弗洛伊德所讲的幸福的获得与种类的延续。事实上,文明发展到今天,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有些人群所处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我们所谓的文明的阶段,但他们一样生存得很好。这或许可以归因于他们得到自然的恩赐太多,所以不需要发展出很文明的事物。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文化也好,文明也好,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服务于人类的追求幸福与连续性存在的目的。文明与文化之间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即文。笼统地讲,文涵盖了人类的一切创造物,技术、宗教、政治、思想,都是文的渐次展开,是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取得的不同的文的成果。

中国古代圣圣相传的斯文,首先是指文化的整体气质。从五千年前文明开辟一直到晚清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政治文化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其间有从宗教到世



俗的转变,有从以礼治国到以法治国的发展,有不止一次的蛮族入侵,但这个文化的气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对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角度看,能否把握斯文的本质,意义至关重要。

在《斯文与中庸之道》^①中,笔者提出过一个论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中国古人信奉中庸之道,有很大关系,而斯文的精神即在于中庸之道。这个论点,某种意义上讲与宋儒的道统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宋儒关注的是道统的继承,^②笔者关注的是,因为有这种有意识的继承,而使得文明保持连续。关于古人有意识地继承这种精神的判断,亦非宋儒首倡,先秦儒家已有此认识,《论语·尧曰》首章所记述的就是这个判断,并且,据学者研究,近年面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已经有了以中为统的观念。^③统的观念在汉代也颇为流行。宋人张载有“继往圣之绝学”之说,这是据韩愈的孟子之后道统失传的道统论发出的宏愿。宋人还有另外的道统系谱,如王偁就说:“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尝轻以畀人。然自孔子以来,千有余载之间,得其正传者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没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有荀卿,荀卿之后而扬雄出,雄之后而韩愈继,愈之后而修得其传。”^④这里,荀子、扬雄都被认为是传斯文之人。不管采用哪种说法,有一点不容置疑,古代人的传承文化精神的意识本是很强烈的。

笔者以为,文明的连续,思想家固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政治相比,其力量其实是很有局限的,没有政治上的有意识地接续传统,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将是非常虚幻的事情。宋代之所以能出现斯文的复兴,即与宋皇室的推动密切相关。^⑤所以

① 文载关世杰主编:《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此处之道为中,见朱熹《中庸章句序》。

③ 黄人二:《战国简保训通解:兼谈其在中国经学史上“道统说”建立之重要性》,《中国哲学史》2010年3期。

④ 王偁《东都事略》卷七十二。本节以及第八章第五节引唐、宋著者之说,皆系自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而得,特此说明。

⑤ 参本书第八章“政治文化转型与斯文重建”。



关于宋之前的斯文的传承,笔者更倾向于唐萧颖士在《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中所阐述的一个意见,“以暨暴秦,划乱坟籍,瞽聋兆庶,王者之风殄矣,生人之道穷矣。天之未丧斯文也,帝道复兴于汉家,数百年间,而宪章具举。夫其推步律历,帝尧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禅,帝舜时巡之义也;约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时之舞,以纘后夔之乐。臣窃观三代之作,胎范垂训,体国绥人,虽载祀延长,德泽深远,皆因循辙迹,故弗易其事。”^①这里赋予了汉代在传承斯文上的重要性。确实,没有汉代人的有意识地保存斯文,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事实,政治界与思想界对于斯文的有意识的传承也是事实,至于说这种意识若明若暗,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历史关键时期出现关键人物,历史的选择就是正确的,而影响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人物本来就不多。^②据此,笔者的对于斯文与文明连续性发展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判断,应该有一定道理。

既然如此,斯文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其在发生阶段的表现,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澄清,对于我们认识汉代、宋代的斯文的传承以及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本书关注的中心话题。

二

追求文的原初意识,笔者以为来自于对于人禽之辨的关切。笔者曾将《大戴礼记·五帝德》的“黄黼黻衣”作为人道、文道的象征。^③黻,古人解释为蔽膝,并且还指出,黻是先民最早的遮蔽隐私之物,有前后之别。按照孟子的讲法,羞耻之心是

^① 见姚铉《唐文萃》卷二十五。

^②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并未失效,文明的连续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杰出人物,政治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都是捕捉到了人民的心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宋代的改武从文,就是响应了人民的心声。汉代的史料保存不多,但汉初思想家关于秦亡的一致观点,就是秦不修仁义之术,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秦即瓦解,希望汉统治者偃武休文,这也是顺应民心的选择。再上溯到周初放马华山桃林之举,也是顺应百姓之望。

^③ 参拙著《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上编《大一统帝系发生论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所以鬻是人告别动物的标志之一。在古人看来，文是为与禽兽相区别而创造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主题。

但问题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用衣服遮蔽隐私之处，不是中国先民的独创，以此作为斯文创造的原点，固然可以，但这并不能作为斯文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气质的论据。斯文为中国人的气质，子贡曾有论说。笔者在前揭《斯文与中庸之道》中提到子贡与棘子成的对话，《论语·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子贡以虎豹有文之皮与犬羊无文之皮的类比作为文质同一的证据，是有道理的。看起来虎豹之皮有文，但那本是天生，并非后天养成，将文质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有缺陷的。这符合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精神。后来王充讲“人之有文，犹禽兽之毛也”（《论衡·超奇》），也是将文视为天赋之气质。文固然是人类的文化创造，但不同气质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也是客观事实，而文化的不同，除了地理环境等因素外，还可以追溯到人的精神气质的差异。

斯文的精神气质，浸透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最为根本的一点，是在基本制度上的体现。近代以来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阶级，如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之封建贵族，唯于周代见之。……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再是为他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而况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人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常有时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①梁先生的论说有没有切中古代社会的要害，可以暂不讨论，但他所描述的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古代社会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西方古典学家用“亚细亚的”描述东方社会，这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创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51—152页。



始人的认可。西方学者魏特夫用“东方专制主义”描述东方社会，^①也是基于东西方社会历史的差异提出的。

中国古代没有类似西方思想家所讲的阶级，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可以用财产拥有量为标准对人群所做的层次划分，只不过，这种划分在社会运行中所居的支配地位，不像在西方社会中表现得那样赤裸裸。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这个礼，是指先王治理天下的道，其核心价值是和谐，因为以和谐为制度安排的中心，以经济为基础的划分界限，无形中被淡化了。这是中国古代阶级观念不甚明显在制度上的重要原因。

更为关键的是，古代礼的制作是以文为追求的目标的，文是天所赋予古代圣人的特殊的德行，圣人制礼本身是对天命的实现。尽管礼在实践中给人的印象是等级分明，但在等级分明的体系中，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即天命，等级的意义在于不同的人承担着不同的天所赋予的权利与责任，只要人们判断出人间已无天道，这个等级是可以推翻的，古代的朝代更迭、农民起义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推翻、重建这个等级体系。这与西方社会中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毫无疑问，在东方，在中国，是政治而非经济主导着社会的运行，这是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最大不同。这样讲，并非要否定唯物史观，只是在运用这个原理解释中国历史现象时，首先要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性。

中国的这种文明是如何出现的，古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文从天上来，从自然中来。孔子曾提到尧之文章本于则天（《论语·泰伯》），他自己讲其传承斯文关乎天命（《论语·子罕》）；《周易·系辞传》讲圣人观象系辞、观象制器。总之，古人的观点，文明的创造来自于天，来自于自然给我们的启示。

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对于斯文的出现，有不同的解释。前面提到的魏特夫用“治水社会”来指称东方社会，言下之意，这种社会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形成的。

^① [美] 卡尔·A.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